

武汉文史资料

亲历 亲见 亲闻
大型文史月刊

WUHAN WENSHIZILIAO 总第100期 2001.2



陈忠、李济 辛亥革命中的基督教界人士

余文祥 李之龙与楚剧

萧志华 武汉史林中的“一枝独秀”

蔡公“汉阳事件”真相

古远清 余秋雨与“石一歌”

傅志义 我给邓小平、聂荣臻当保健医生

ISSN 1004-1737



771004 173007

《武汉文史资料》100期纪念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1年第2期

总第100期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殷小琴

执行副主编:徐双明

责 任 编 辑:李 炜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征文

□4 辛亥革命中的基督教界人士 陈 忠 李 泽

难忘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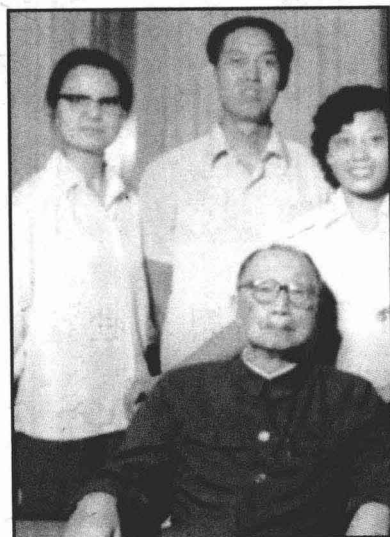
□6 我给邓小平、聂荣臻当保健医生 傅志义

百期专稿

- 13 武汉史林中的“一枝独秀”
——回忆《武汉文史资料》创刊及其发展历程 萧志华
- 17 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重要渠道
——从艾毓英的问题中得到了证实 吴先铭
- 19 《武汉文史资料》创刊之初二三事 吴自强
- 21 回忆《武汉文史资料》对我的帮助 刘志斌

历史回眸

- 22 “汉阳事件”真相 蔡 公
- 26 追忆“汉阳事件” 黎 角
- 28 得人心暖人心的平反善后工作 穆心言



往事漫忆

- 31 我和著名金石书画家曹立庵的情缘 江海清

史海钩沉

- 37 余秋雨与“石一歌” 古远清

文史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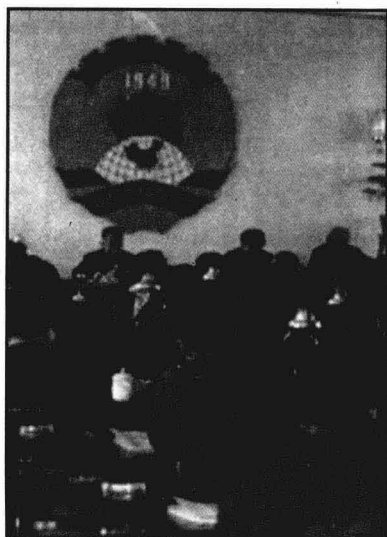
- 40 也谈刘湘之死兼及川军抗战 胡昌民

戏剧舞台

- 42 李之龙与楚剧 余文祥
□45 楚剧名伶沈云陔 许恺景

教育史话

- 47 解放后湖北省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胡邦宁



封面图片:《武汉文史资料》百期集锦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 - 1737

CN42 - 1032/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4.32

• 老照片 •



周恩来赴宣化店途中,在黄陂县涉水过潏河的情景。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1年第2期

总第100期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殷小琴

执行副主编:徐双明

责 任 编 辑:李 炜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征文

□4 辛亥革命中的基督教界人士 陈 忠 李 泽

难忘岁月

□6 我给邓小平、聂荣臻当保健医生 傅志义

百期专稿

- 13 武汉史林中的“一枝独秀”
——回忆《武汉文史资料》创刊及其发展历程 萧志华
- 17 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重要渠道
——从艾毓英的问题中得到了证实 吴先铭
- 19 《武汉文史资料》创刊之初二三事 吴自强
- 21 回忆《武汉文史资料》对我的帮助 刘志斌

历史回眸

- 22 “汉阳事件”真相 蔡 公
- 26 追忆“汉阳事件” 黎 角
- 28 得人心暖人心的平反善后工作 穆心言



往事漫忆

- 31 我和著名金石书画家曹立庵的情缘 江海清

史海钩沉

- 37 余秋雨与“石一歌” 古远清

文史随笔

- 40 也谈刘湘之死兼及川军抗战 胡昌民

戏剧舞台

- 42 李之龙与楚剧 余文祥
□45 楚剧名伶沈云陔 许恺景

教育史话

- 47 解放后湖北省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胡邦宁



封面图片:《武汉文史资料》百期集锦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1737

CN42-1032/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4.32



辛亥革命中的 基督教界人士

□ 陈忠 李泽

活动于 1904—1906 年的日知会，是辛亥革命前我国著名的革命团体之一。日知会的革命活动与辛亥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日知会创办于武昌高家巷基督教圣公会，并以此为本部开展革命活动，影响所及，除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以外，远至东北和新疆伊犁。以后，湖北的许多革命组织都与它直接或间接有关。日知会这个革命团体的发起人刘静庵、胡兰亭、曹亚伯都是基督教徒，而且胡兰亭还是一位牧师。日知会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大造革命舆论，同时以教会学校文华书院学生为主体组成的“救世军”，外出布道，带有反清色彩。此外还

大量秘密散发《革命军》《孙逸仙》《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日知会的革命活动，为提高群众革命觉悟、培养革命干部、发展革命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参加日知会活动的主要成员是军学两界，但也有新闻界与基督教界人士。1906 年冬，日知会被清政府破获，有 9 位革命领袖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有 2 人在狱中死去，其余 7 人于辛亥革命成功后，才被释放出狱。

在湖南，基督教会也有许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最突出的事，则是长沙基督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营救黄兴（原名黄克强）脱险。1904 年秋，黄克强在长沙

密谋起义，事泄，清廷捕黄甚急，得基督教圣公会牧师营救，隐居圣公会近一月。后来黄吉亭牧师用“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护送黄克强离开长沙，然后乘日本沅江轮护送至汉口，又由汉口乘轮至沪。黄牧师送黄克强至船上并秘嘱：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可。黄兴亦因此而得名。

在广东一带。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基督教界人士那就多一些，限于篇幅，略举二例：1、广州伦敦会牧师杨襄甫与孙先生交往甚密，在孙先生授意下，以广州沙基三个药铺为革命党人作掩护。孙先生有次在外活动遭清兵追捕，避入该药房，幸亏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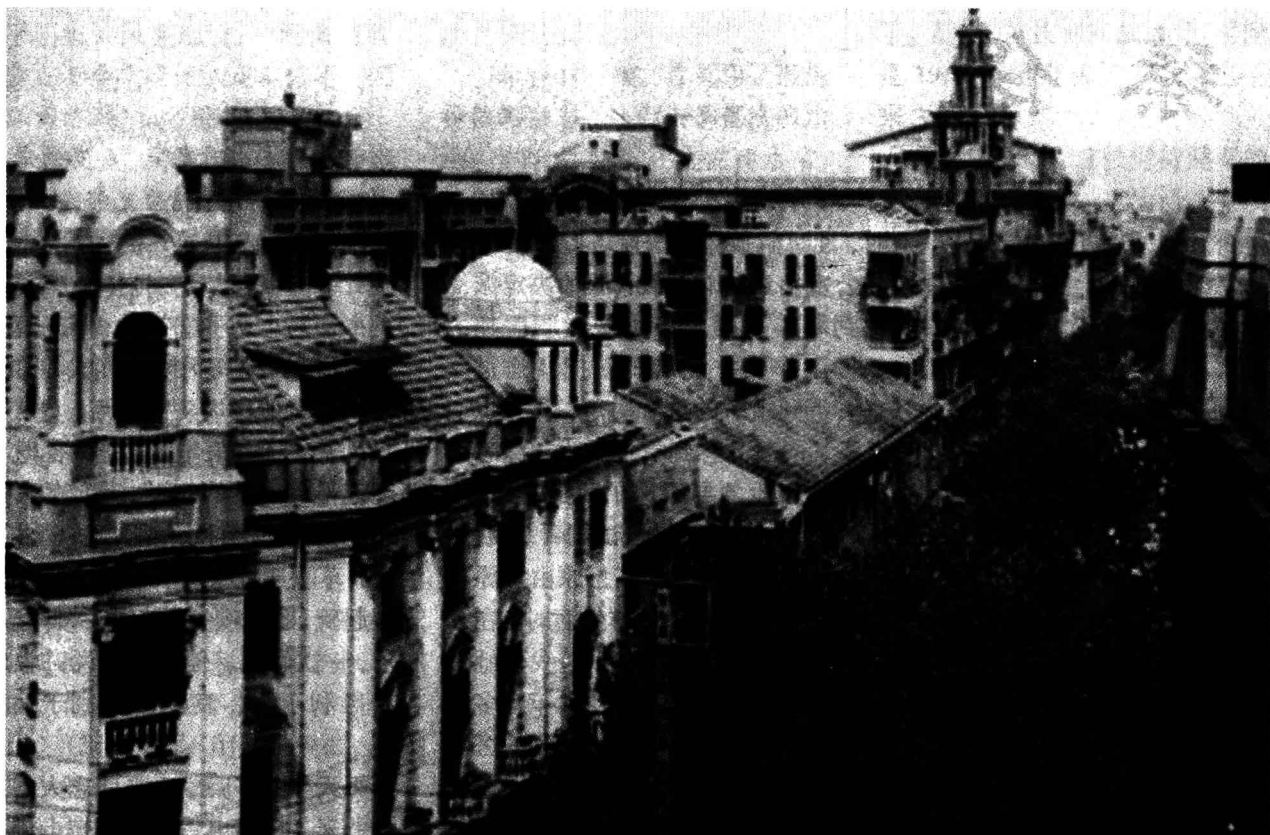
牧师在前面应付清兵，孙先生才从后门走脱。后杨调职至佛山走马路伦敦会福音堂，孙先生又因广东清政府严缉，逃至杨家，得杨掩护。2、美瑞丹教会为了传教方便，曾设有“福音船”沿珠江上下回游，向水上船民传教。当时孙中山通过基督徒肖以滋等人的关系，利用“福音船”的有利条件作为掩护革命党人的“交通船”。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多次函谢肖以滋等对革命的援助，还答应把广州象岗这块地捐赠给教会兴建礼拜堂，作为酬谢基督教界人士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帮助。

此外，还有一些广东华侨基督徒，在国外支持孙先生的革命，其中有一位是与孙先生同时发起“兴中会”的五成员之一。有的广东华侨参加黄花岗战役的

战斗；有的变卖大批财产支持孙先生；有的以传教行医为掩护支持孙先生；有的兄弟二人因为参加革命被清政府杀害。还有一位名叫张新德的基督教徒，曾带领民军攻打花县清政府，当了花县的临时县长等等。由于他们对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辛亥革命胜利后，有的基督徒都在孙先生的革命政府里担任要职。

除部分中国基督徒支持反清革命以外，在湖广地区，有的洋教士也支持反清革命。在武汉的基督教圣公会鄂湘赣教区吴德施主教（Bishop L·H·Roots），就是其中之一。日知会的革命活动之所以能在武汉、九江、长沙等地以圣公会作为基地蓬勃开展，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吴德施主教以及美国牧师孟良佐

（Gilnian）等人的默许、掩护与支持分不开的。1906年冬，日知会密谋起义事泄，刘静庵等9人被捕，清廷判决全部斩首。由于吴德施等想方设法尽力营救，刘静庵等人被改判为永远监禁或十年、十五年监禁不等。就在武昌首义的前几个月，吴德施还在英文刊物《教务杂志》1910年元月号上，发表了《为中国辩护》的文章。文中谴责了西方国家伤害中国的行为，并盛赞“中华民族在亚洲各民族中的至高地位，确实基于它的智力与道德的优越，而不是凭什么军事或政治才能而取得的。”吴德施文章中的许多赞美中华民族的话语，至今读来，仍然倍感亲切。





我给邓小平 聂荣臻

当保健医生

□ 傅志义

1983年8月13日，邓小平夫妇与随员
(后排左一为傅志义)在长白山天池合影。



编者按：傅志义曾先后任邓小平、聂荣臻同志保健医生，现在沈阳军区大连第一疗养院工作。傅志义1970年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0医院工作。1978年底调北京解放军总医院。1980年8月至1983年8月为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1984年3月至1985年10月为聂荣臻元帅的保健医生。

(一)

1980年8月15日上午10时，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邓小平同志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并说次日就把我送过去。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深恐力不从心。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放开胆量，试试看。”后来，我才得知调我的真正原由。原来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生病时，在总院南楼四病室住院期间，我是她的主治医生。卓琳同志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考察、接触，觉得我的医术、为人等“还可以”，遂做出了这个决定。

小平同志当时已是76岁的老人，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身体非常健康。

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算作“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我在他身边工作三年，竟从没见过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记得最清楚的“病”，是他的血脂一度偏高。我们让他服草决明汁治疗，草决明汁又苦又涩，小平同志端起碗，嗅了嗅，皱皱眉头，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他风趣地说：“良言苦心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每天早晨8点，小平同志大多就会醒来，按响电铃，值班护士进



去给他测量血压。洗漱后，就在书房兼办公室里喝杯牛奶、吃根油条。接着就是一边喝浓茶一边批阅文件。他杯子里的茶叶放得很多，待全部泡开，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他喜欢喝四川、安徽出产的青茶，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小平同志的办事效率很高，一般在10点钟左右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之后，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便乘车外出；没有，就坐在沙发上看书报、打打桥牌，活跃活跃脑子。

首长生活很有规律，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菜肴：回锅肉、扣肉、粉蒸肉、大肥肉等，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萝卜丝等。他家有规矩——不浪费，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下面吃。小平同志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不会吃剩饭的是瓜娃子（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首长健康的身体得益于运动。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他总要抽出时间，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10多分钟，活动活动筋骨。雪雨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首长散步的习惯是在1959年养成的，那时他的腿骨折，为了恢复腿的功能开始锻炼。之后便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散步，从不间断。他对待散步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不偷懒，不抄近道，不拖泥带水。他家的院子里最大外缘约140米，首长每天固定走18圈。他散步时目不斜视，步履坚定，沉默无语，不用别人提醒，绝对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他还爱好游泳，且从不到人

造的游泳池里游，而是爱在自然的大海里畅游。他说在大海中游泳自由度大，有股气势。在大连、秦皇岛等海滨城市疗养、视察时，他几乎天天都要下海一游。他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天再冷，浪再大，他仍乐此不疲。甚至下大雨，他也要下海去游。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从安全的角度进行劝阻，他笑着说：“你们不懂，水里是暖和的，雨天游泳才舒服。”他每次下海都采用蛙泳姿式，头从来不潜入水中，一个姿式要游一个多小时。他游泳的时间、水平，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不如、望尘莫及。他每次游泳，岸上都有人专门掌握时间，时间一到，便摇小红旗通知“撤退”。有一次，游到中途下起了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催大家上岸。小平同志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他游兴未尽，仍勇往直前。

年轻的时候，首长为了锻炼身体和意志，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年龄大了后，不能洗冷水浴，他就洗热水澡。在家也好，外出视察也罢，习惯于星期六午休后洗一个热水澡。我们常常在他的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这样做，对老年人干燥的皮肤能起到较好的养护作用。

小平同志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平凡的球迷，他对足球情有独钟。

早年，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特别喜欢足球，情愿受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文革”后，他第三次复出，首

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他步入老年以后，对足球的兴致仍不减当年，每逢电视中有重要的足球赛事，他都要观看，对于一些特别的比赛场次，他还要求临时调整一下生活安排，甚至暂时停下一些活动，集中精力观看比赛。

抽烟，是小平同志多年来不曾改变的嗜好。我作为保健医生，当然知道抽烟有害无益，但具体问题就具体对待，像他这样有着多年烟龄的“老枪”，如果一下子戒了，反而会引起机体平衡失调，危害更大。况且他当时在抽烟问题上已经做了最大克制。平时在家办公基本上不抽烟，会见外宾或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烟。有时，我见他一面跟外宾谈话，一面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在手里转来转去欲吸又止，最后还是又放下了。后来，首长彻底戒了烟，时间是1989年完全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

据我观察，首长保持健康的秘诀主要有三：一是生活很有规律，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配得很合理，饮食上不暴饮暴食。二是心态平和，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三是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乐趣多多。

人们常说隔代亲，首长也不例外。每天上午10点左右，他会放下手中的活，一边舒展筋骨，一边走到“老祖”（夏伯根老太太，小平同志的继母）的房间，看看住在那里的小外孙女羊羊（邓榕的女儿，当时只有两岁多），与羊羊说上几句话，问吃问喝，并拉着她的小手逗玩一会儿，其乐



融融。

小平同志的家是四世同堂，上有“老祖”，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照民间的说法，真可谓儿孙满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饭，是一家人相聚最齐的时间。十多个人，分坐两桌，子女们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很有一些“信息交流中心”的味道。大家七嘴八舌，但首长却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民主融洽的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小平同志胸襟开阔，对死看得很坦然，无论出现怎样的意外情况，他都遇事不惊、泰然处之。

1982年春节过后，我们随小平同志从广州乘专列回到北京。一天上午，他在专列的会客厅中聚精会神地看书，我则坐在一旁随意地翻阅画册，当专列经过武汉长江大桥中段时，突然发出一声剧烈地撞击声，我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迅速冲过去保护小平同志。我见他身后左上方，相距不到1米远的一块玻璃被砸了个大洞，幸亏车窗是双层玻璃，里面的一层没有破。警卫处长张宝忠和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而小平同志却处惊不乱，只是抬头向身后瞟了一眼，又没事似地继续看书。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对此事作了认真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经常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新闻媒体谎报首长身体状况的报道。有一年夏季，我们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下午，警卫处长张宝忠拿来一张报纸给小平同志看，上面刊登着外国记者捏造的“邓小平遇刺，被贴身保镖救护，保镖已身亡”的消息，而张宝忠就是这条消息中所说的“保镖”。小平同志看后微微一笑，不屑一顾，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觉得很可笑。当时，我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想些什么。几年以后小平同志才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我还注意到，七、八年后小平同志会见客人时，曾谈起新闻媒体又有两次谣传，一次是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提到：“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一次是1990年5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老朋友穆巴拉克总统时提到：“前两三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了，我很高兴你见到的是一个活人。”

小平同志是个非常注意工作效率，也特别善于处理工作与休息的伟人。

小平同志曾对外国朋友说过：“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工作。”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小平同志时，问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两小时。”华莱士听后，颇为吃惊。作为他的保健医生，我计算过，如果扣除会见外宾、开会及外出视察，他每天8点至10点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也就两个小时左右。

然而，他的工作时间远远不只坐在办公桌前这部分。据统计，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宾187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参加各种重要会议61次、追悼会7次，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会见党外朋友21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5次。还有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务，比如在北京市区参加植树活动等等。如果把这些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些数字，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多年的政治生涯，使小平同志养成了少言寡语，以柔克刚的性格。然而，一旦到了正式场合，马上妙语连珠，谈笑风生，这一点，国际上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之赞叹。

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允许我们工作人员在场。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就国际关注的一些政治敏感问题深入采访了小平同志。法拉奇有备而来，采访一开始便提出一连串的棘手问题，而小平同志则从容不迫，有问必答。特别是对她精心设置的“提问陷阱”，都巧妙地作了精彩的回答。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好评。1982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来访时，称赞小



平同志说：“你是唯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据我观察，首长会在会见外宾前一般不看什么资料，有时甚至还看点《聊斋》或武侠小说什么的。每次会见，大都安排在上午10点以后。时间一到，工作人员进门提醒一下，他就放下手中的书报，换上衣服梳梳头，便驱车前往会见地点。有时提前一个小时，去北京饭店理理发，吹吹风，再见客人。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总会准时出现在会客厅。

1983年2月，我作为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到江、浙、沪视察。在杭州视察时，正值春节。14日下午，当地领导安排首长去参观岳王庙。小平同志携家人及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前往栖霞岭下的岳王庙。进入岳王庙大门，拾级而上，步入正殿。首长在岳飞塑像前驻足片刻，然后招呼岳王庙文保所所长骆寄平和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在岳飞像前留影。

过墓阙，来到石碑廊，廊里陈列着岳飞的诗词与奏札手书刻石。在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碑前，骆寄平所长诵起了碑文。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呢！”说毕就吟了起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知不觉中，大家来到阶下四个奸贼的跪像前，小平同志把外孙蒙蒙、外孙女绵绵拉到身边，给他们讲述秦桧卖国陷害忠良的历史故事，并

用手指着四个奸臣的像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接着，他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继续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并语重心长地对外孙、外孙女说：“你们长大后，要像岳飞一样报效祖国。不能做秦桧，秦桧遗臭万年。”首长平易质朴的话语，是说给他的后代的，也是说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游客的。首长那天兴致勃勃游得很开心。

小平同志外出视察、休假的时间，通常都安排在孙子孙女们的寒暑假。这样，他既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又可以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

(二)

1984年春节过后，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及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聂荣臻元帅医疗组工作。当时，聂帅正在住院治疗。3月底，聂帅病情稳定，准备出院，组织上决定让我

们医疗组伴随聂帅回家，继续为他老人家巩固治疗。

真挚厚道的长者

我在聂帅身边工作时，聂帅已85岁高龄，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肠功能紊乱等严重疾病，尤其是伪膜性肠炎，迫使他一直控制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大小便。种种疾病都严重地威胁着聂帅的生命，为此，中央高层、总医院领导和我们都非常着急。然而，聂帅本人却处之泰然，并乐观地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我没想到能活这么久，比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老帅活的时间都长，我已经很幸运了，现在去见马克思也是死而无憾了啊！”

尽管聂帅身体在十个元帅中是比较差的一位，但他确实比“其他老帅活的时间都长”，这得益于他达观的人生境界，得益于他对待生命与疾病所采取的科学态度——他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像对待工作一样，充满了



一九八四年夏，聂帅在北京住地与医护人员合影，后排（中）为作者傅志义。



科学态度。还有就是他生活规律,按时作息,饮食清淡,不喜油腻,不沾烟酒。

聂帅主张活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量力而行,不过度劳累。他常风趣地说:“人生70而拐,80而车。我的体会是,人过了70岁,行动就离不开拐杖了,过了80岁,行动就离不开手推轮椅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聂帅持之以恒、锻炼不辍。不能拄着拐杖散步,就扶着手推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站不稳,就由人在身后扶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不行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老师就是这样顽强地和疾病斗争着,拼搏着。

“润物细无声”,聂帅爱人以德,感人至深。聂帅对我们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要求每一个人在本职工作上都要尽职尽责。最让人感动的是,他鼓励我们医生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著书立说,搞好老年病学研究。在聂帅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养成了自觉、努力工作的好习惯。大家都是每天早晨一早就超前或准时上班,进门就忙着打扫院子里的清洁卫生。

聂帅对我们的学历、性格、爱好都非常熟悉,了解得很仔细。有一天,聂帅高兴地询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他老人家说:“首长,我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我们学校的前身是老白校(白求恩卫生学校),就是您抗战时期建立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现在,这所院校又恢复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校名。”聂帅听我这么一说,沉思许久后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引起了许多国际友人的关注。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抗战的环境极其艰苦,医疗条件也差,白求恩来到中国,我聘他为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为办好卫生学校,致力于编写教材并到各地医疗卫生单位巡视,传授知识,检查工作。他爱护伤员,真是无微不至。他还向学校捐赠了显微镜、小型X光机和从加拿大带来的医学书籍。白求恩逝世后,为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40年,我们把军区卫生学校易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

聂帅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记忆特别好,对到晋察冀来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国际友人永不忘却。聂帅还给我讲过印度医生柯棣华、巴苏华及奥地利医生傅莱等人的故事。

让我惭愧的是,一次,我为聂帅做身体检查由于当时有些拘谨而没有做好。那天,总医院领导陪着我轻轻地走到他身边,聂帅当时正躺在病床上闭目养神,院长向他报告说:“首长,傅医生来了。”聂帅仰起头,微笑着向我招手,瞬间,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中,我大胆地走到他身边说:“首长好,我叫傅志义,现在来为您的身体健康服务,请允许我给您做一次检查。”

我按平时测血压的习惯,正往气带里充气时,聂帅用右手指点着他的左肘窝,示意他那里不舒服。此时,我才发现自己为了省事把袖带缠得太靠下了,我红着脸马上纠正。聂帅见我有些愧疚,便风趣地为我解围说:“我和傅作义可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聂帅一席话,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从此以后,我彻底改正了不正规测量血压的不良习惯。有时看到其他医护人员也像我过去那样不正规操作时,就提醒他们应正确操作,不要给病人增加痛苦。

聂帅心底无私,高风亮节,他把身边的每个工作人员都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每逢年节,聂帅都要请我们医务人员到他家吃团圆饭。聂帅家的川菜“水煮肉片”很正宗,四川小吃“豆花”更让我爱不释口。小平同志亦曾几次携家人来聂帅家吃豆花,小平同志评价“聂帅家的豆花最地道”。

热爱生活的元帅

聂帅的家在北京景山公园东北角一条宁静的小胡同里,庭院深深。院子里的树很多,既有四季常青的松柏,又有伟岸挺拔的银杏;既有傲骨御霜的翠竹,又有婆婆娑娑的紫萝藤。仿佛一座天然植物园,满眼都是春。

聂帅很喜欢绿化,认为绿化是文明生活的一种表现。聂帅对松柏树情有独钟,院子里处处都是挺立的松柏,就连室内墙上挂的国画也全是松柏图。老师说,松柏挺拔,不畏严冬,经年青翠,威武不屈。为人就应像松柏一样,忠诚、正直、坚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聂帅80岁生日时,还自题了“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的联句。

那棵银杏树位于院子正当中,树龄很长,树干挺拔,高达30米。银杏俗称白果树,性分雌雄,那棵树属雌性。夏季枝繁叶茂,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

秋季果实累累。每年深秋白果成熟时节，聂帅总是督促我们集中收获，去其肉取其核，精心挑选一些最大最好的果子，及时给邓颖超同志送去。白果可入药，对邓颖超补养身体很有帮助，邓大姐每次收到后，都会给聂帅打电话表示感谢，并祝聂帅珍重身体、健康长寿。

聂帅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纵然暮年，也经常坐着轮椅，在绿树丛中流连忘返。聂帅说，古人有喜莲的、爱菊的、咏梅的、颂柳的，虽喜爱不同，但都是借物明志，抒发自己的爱憎之情。

聂帅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硕大的办公桌摆着文房四宝，整面墙的书柜中，摆满了各类书籍。书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圆瓷盘，拷贝着周总理的头像。聂帅对周总理非常崇敬，他说周总

理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聂帅不喝酒，不吸烟，不讲究吃穿。他的卧室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极其普通的木床，上面铺着最常见的白布床单，床单中央还有块补丁。卧室内的一大件摆设，是一个褪了色的双开门立柜，里面放

置着首长常用的换洗衣物，有的外衣还是 50 年代穿过的旧军装。

在聂帅的言传身教下，他们一家和我们工作人员都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衣着朴素。聂帅对社会上奢侈浮华的不良世风很是不满，对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更是反感。他常说，改革后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即使人民生活很好了，勤俭节约的精神还是不能丢！

虽然聂帅物质生活很俭朴，但精神生活却无比丰富。他有不少爱好，第一是老家的川剧，他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艺术都很优美；第二是京剧，他经常将自己珍藏的几盘京剧录像带拿出来重复播放。一次，聂帅用手指着正在播放的《空城计》对我说：“这是国粹，多看几

次你就会觉得好看了。”在聂帅的启发下，我对京剧入了门。

聂帅习惯于每晚边看《新闻联播》边进晚餐。他特别关心国际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看到个别国家打仗，老帅会担心；看到贪官被曝光，老帅会痛骂；看到又有地方刮大风或者下大雨受灾了，老帅会叹天道无常。聂帅尤其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倍加关注。每当四川老家有人来看他或会见主管农业的同志时，老帅都要详细询问收成或农业基本建设情况。他对新闻后的《天气预报》更是格外关注，自己看过不算，还经常问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遇到天气恶变发生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时，老帅就寝食不安。因为战争年代发生过的青黄不接、久旱无雨，部队和群众严重粮荒的艰苦情况，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记忆太深了。

聂帅很喜欢小孩，一见天真可爱的孩子就心情愉悦。聂帅对老战友和烈士子女感情更加诚挚。任弼时同志的儿子任远曾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台灯送给聂帅，老帅一直将它放置在床头柜上，整整 15 年从没更换。“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这是毛主席对聂帅的评价。聂帅不仅自己厚道，还教诲自己的晚辈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常说：“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相互尊重，就是谦虚谨慎。”

壮心不已的老人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聂帅为中国国防科



技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

聂帅身体一直不好，但他每天还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关心着国家和人民，关心着改革开放事业。

聂帅对我国的老龄事业无限关怀，不断从战略高度提出重要的指导思想，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先后写了14封指示信和题词，为推动我国老年事业的迅速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聂帅不遗余力地强调：“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着的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把老龄问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他为解决好我国日益迫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指明了方向。

1984年8月7日，聂帅在给全国第一次老龄工作会议的贺信中又进一步指出：“老龄问题是多学科的复杂的科学研究问题。如何解决好关心照顾老年人，妥善安排老年人的生活，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这是当代老年人的迫切愿望和时代的要求。”聂帅还进一步强调：“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应当受到社会的重视和珍惜。”

后来，我调回大连部队疗养院工作，临走时，聂帅还教导我一定要为部队的老同志好好服务，要让他们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聂帅还一再鼓励我们医务人员要搞好老年医学研究。

198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请求聂帅为我院题字，他欣然题写了“康乐”两个大字。聂帅的墨迹刻成石碑后，矗立在我院分

院内。至今，聂帅的珍贵题词鼓舞着我们全心全意把部队老龄工作做得更好。

聂帅还非常关心计划生育工作。他说：“我国人口多、基数大，若不提倡晚婚、晚育，人口膨胀起来，可土地就那么多，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国富民强是非常困难的。”说到这里，他还用手拍着自己的椅子幽默地说：“你们看我这个家庭，就是个‘标准家庭’，我只有一个女儿，又只有一个外孙女。”聂帅一席话，令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笑了。

作为北京市的老市长，聂帅时刻都关注着北京市民的衣食住行。老帅对北京城市建设的变化感到高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发展令他更是欢欣。聂帅时常说起北京刚解放时的状况，我们也不断地向他讲述北京日新月异的新变化，老帅每次听我们说时都很激动，无奈身体状况不佳，不能经常亲自外出走走看看。

有一天，聂帅的心情特别好，他对我们说：“今晚咱们去看看北京城的夜景。”晚饭后，我们陪伴聂帅驱车驶过东、西长安大街及几处立交桥，聂帅非常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平地而起的新高楼，畅通无阻的立交桥，五彩缤纷的霓虹灯，笑逐颜开的行路人。后来，我们担心时间长了他身体支持不住，便劝聂帅打道回府。可老人家却摇摇头，坚持还要继续看。

1985年11月，我调回大连。在我离开老帅身边工作之前，聂帅赠我一部专著，名为《聂荣臻回忆录》。老帅在扉页为我签名时，身边的一位护士快语提

醒他说：“傅医生叫傅志义。”聂帅瞅了她一眼，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晓得。”还不无风趣地复补一句：“他与傅作义还挂些边呢。”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笑了，我也再一次想起刚来为他老人家测血压时，聂帅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和傅作义可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93岁高龄的聂荣臻同志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旅程。遵照聂帅遗愿，他的部分骨灰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北侧山坡的一棵桧柏树下。那棵高8米的桧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骨灰撒放在桧柏树下，正符合聂帅生前爱树、种树、更加钟爱松柏的心愿。“让骨灰化作泥土，滋养青松翠柏，为后人遮荫，是爸爸的最后心愿和奉献。”聂力用黄土覆盖聂帅骨灰时说过的话，至今仍响在我的耳边。

戎马一生经百战，呕心沥血育两弹，功勋卓著比日辉，安详含笑万古垂。

聂帅，一棵桧柏！一座丰碑！！彪炳千秋！！

（该文系傅志义口述，碧红整理）





武汉史林中的

“一枝独秀”

——回忆《武汉文史资料》创刊及其发展历程

□ 萧志华

《武汉文史资料》自1980年创刊,至今已出版100辑。20年来,由于刊物坚持统战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已成为湖北武汉地区别具特色的文史期刊,被社会公论为“武汉史林中的一枝独秀”。

我于1980年初从《光明日报》社调到市政协,具体经手《武汉文史资料》的开办和编务工作,到1995年初退休,又继续留任了近3年,于1997年底换届,整整干了18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今天特撰写创刊及其发展历程,以作为对《武汉文史资料》出版100辑的祝贺。

来之不易的出版权

《武汉文史资料》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的公开发行人刊,这在全国政协系

统来说,是副省级城市中唯一仅有的。在武汉地方史学领域,也是独此一家、独树一帜的。这个珍贵的出版权,回忆起来,确乎来之不易。

1980年4月,市政协组建新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恢复文史资料工作,并决定出版自己的文史期刊——《武汉文史资料》。我们在抓紧做好征集稿件的同时,及时报告市委宣传部向湖北省出版局提出申请,要求准予核发出版刊号。并还利用湖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部主任杨中岳是市政协委员的关系,从中帮助联系。经过努力,省出版局发下准印证,限定我会内部出版发行,于是有了合法的内部出版权。但我们按公开刊物的标准从严要求自己,做到坚持特色,履行出版宗旨,按期出版,不断提高出版质量,从而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称赞,很快在

武汉地区站稳了脚根。

1985年,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湖北地区出版物欣欣向荣。于是,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决定,通过对刊物的重新登记,批准一部分内部刊物为公开刊物。《武汉文史资料》由于几年来的出版实践,证明是一份政治方向明确、有较高出版质量的期刊,通过我们的积极申请,终于批准从1986年4月起,改内部发行为限国内发行。当时,出版界称之为领到了全国通行的全国粮票。随即在全国恢复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时《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作为公开期刊单位正式被纳入人事主管部门评审系列之一。于1987年首批评审高级职称一人,中级职称二人。

1987年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全面整顿出版市场,使书刊出版逐步走向正规化、规范



化。因此除少数刊物受到审查处理外，对已公开发行的期刊核发统一刊号。《武汉文史资料》是这次最早领取全国统一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的期刊之一。从1988年起，由限国内发行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当年，以国家正式刊物的身份，跻身于省一级政协文史行列。两次参加全国政协由香港委员出面组织的香港和台湾文史书刊展览。我会出版的《晴川名人小传》的有关文章被台湾刊物转载。

《武汉文史资料》始终把鲜明的统战特点和“三亲”特色。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出版工作，被评为湖北武汉优秀期刊之

一。我作为本刊的主编，被选为湖北省期刊协会理事。

广交朋友 组织队伍

要办好一份期刊，需要有相适应的业务工作班子和建立一支基本撰稿队伍。

起步初期，文史办公室只有三名干部和一名打字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孙克钦兼任文史办主任。工作从无到有，一切从头做起，人员少、任务重，困难很多。首先是要把征集撰稿的业务队伍组织起来，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作者群。我们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充分体现统战性的特点，

把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中的有关人士共42人，组成五个专业史组，即革命史组、政治军事史组、工商经济史组、民族宗教史组和综合史组（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社会等）定期活动，研究征集线索，因人设题，因题找人，落实撰稿任务。

同时，通过调查走访，把有“知识和经验”的辛亥老人、老报人、老教师、老文艺工作者、工商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共28人，分别聘请为“特约顾问”、“特约编撰”和“特约发行”，直接参加《武汉文史资料》的组稿、编稿、审稿和出版发行工作。

上述两个方面的成员不计报酬，热爱文史工作，成为办好文史期刊的不可缺少的支柱力量。

著名汉阳籍爱国人士艾毓英，解放前长期在汉担任大学教授，参加过抗日及其它许多政治活动，并曾担任过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代议长，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高的写作水平。我们特聘他为“特约编撰”，并到北京他的住处向他组稿。艾老对市政协文史办的政治礼遇非常感谢，调动了他的积极性，接连写出多篇有参政价值的回忆录，在《武汉文史资料》上发表后，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

原《新湖北日报》社总编辑吴自强，是一位有四十多年经历的老报人，不仅熟悉湖北、武汉情况，而且编辑工作经验丰富，是我们办好期刊不可缺少的帮手。为了聘请吴老“出山”，担任“特约编撰”，我们不辞辛劳“三



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史资料》工作会议